

June 2014

The Changing of the Person in the Narration in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and its Intellectual Implications

Huiying Xie

Weiwei Zhou

Follow this and additional works at: <https://tsla.researchcommons.org/journal>



Part of the [Chinese Studies Commons](#)

Recommended Citation

Xie, Huiying, and Weiwei Zhou. 2014. "The Changing of the Person in the Narration in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and its Intellectual Implications."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34, (3): pp.203-209. <https://tsla.researchcommons.org/journal/vol34/iss3/11>

This Research Article is brought to you for free and open access by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It has been accepted for inclusion by an authorized editor of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关于“真实”的历史建构与知识者的身份认同 ——现代小说叙述人称策略的变迁及其思想史意义

谢慧英 周伟薇

摘要: 作为叙述修辞的基本要素,叙述人称在很大程度上参与了小说对“真实”的建构和表现。在某些特定的历史时期,人称策略一方面呈现出历史语境对于“真实”内涵的潜在规定;另一方面,在更深隐的层面往往又与承担叙述使命的知识阶层的身份认同密切相连。对中国现代小说来说,从“五四”新文学的个性解放思潮向三、四十年代以后的大众化、民族化转型的这三个十年,人称策略的选用及变迁无疑在这两个方面都具有典型性,这将为我们理解中国现代文学场域的复杂性提供一个意味深长的视角。

关键词: 现代小说; 叙述人称策略 “真实”; 知识者; 身份认同

作者简介: 谢慧英,集美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文艺理论专业,主要从事文艺理论及现当代文学研究。电子邮箱: sosofool@126.com 本文系 2011 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规划青年基金项目(项目号: 11YJC751095) 的阶段性成果。

周伟薇,集美大学文学院讲师,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现代文论研究及宗教学研究。电子邮箱: mylifetree@163.com

Title: The Changing of the Person in the Narration in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and Its Intellectual Implications

Abstract: The person used in narration is an essential factor of narrative rhetoric, and it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construction and representation of the “realness” in a novel. The choice of the person in narration may, on the one hand, abide by the implicit imperatives which the historical context enforced on “realness”, and closely links to the identity of the intellectual group who undertakes the task of narrating. The novels during the May 4th Movement in 1919 correspond to the spirit of individual liberation, and the following two decades saw the transformation to popularization and nationalization. The paper demonstrates that, among the modern Chinese novels produced during this thirty-year period, the choice of the person and the changes of the person use in narration are representative in the above mentioned two aspects. The paper concludes that the strategies behind the choice of the person provide a significant perspective for examining the complexity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ry field.

Key words: modern novel; the person in narration; realness; the intelligentsia; identity

Authors: Xie Huiying is an associate professor at the Faculty of Literary Studies, Jimei University (Xiamen 361021, China), with main research interests in literary theory and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Email: sosofool@126.com

Zhou Weiwei is a lecturer at the Faculty of Literary Studies, Jimei University (Xiamen 361021, China), with main research interest in modern Chinese literary theory and religious studies. Email: mylifetree@163.com

对小说创作来说,叙述人称似乎是一个陈旧的理论问题,不足以引起人们的重视。不过,在小说发展的历史中,特别是在某些特殊的历史阶段,人称在小说创作中的运用却与特定的历史潮流、文化动向以及意识形态的要求、知识分子身份认同问题等形成了微妙的呼应——即使是在某些碎片式的言说中,文学与时代、文学与社会以及更为复杂的社会心理之间的密切关联,也会得到意味

深长的呈现。本文将人称问题置于中国小说从“五四”新文学的个性解放思潮向三、四十年代以后的大众化、民族化转型的特殊时期加以考察,以图更为细致地反观现代小说是如何在包括意识形态的制约、文学自身独立性诉求与其历史使命和现实承担等诸多纠结中被建构,并在急剧变动的历史潮流中如何进行调整的;同时,这又与承担了叙述使命的小说家(知识阶层)的身份认同问题

相互缠结,不可开解。

一、人称策略:

对于“真实”的建构与表现

作为虚构叙述,小说存在的前提是在虚拟的情境中建构起被公众依据历史逻辑、现实逻辑以及情态逻辑所公认的“真实”。“这种真实感首先来自于小说世界与生活世界的同构”(徐岱 100-01)。不过,“真实”这一概念本身又是极具历史性的范畴,并且往往是包含着鲜明价值立场的范畴。正如福斯特在《小说面面观》中指出的,“故事是叙述时间生活的,而小说——如果是好小说——则必须包含价值生活”(25)。这里的时间生活,强调的是客观性的外部事实,而“价值生活”则在物理事实之外更包含着叙述主体和叙述对象的“情感生活”。这种情感生活,连同小说叙述修辞所衍生的情感取向、价值判断、艺术技巧等方面的因素,构成了小说的“超故事性”的意义。可以说,叙述人称正是形成小说“价值生活”的一个方面。

作为叙述修辞的基本要素,叙述人称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叙述对象的呈现方式,参与了小说对“真实”的建构和表现,也内在地衍生出小说的价值层面,进而影响到接受者的心理和意志。韦恩·布斯更明确地指出“说出一个故事是以第一人称或第三人称叙述来讲述的,并没有告诉我们什么重要的东西,除非我们更精确一些,描述叙述者的特性如何与特殊的效果有关”(168)。不少小说家表示自己的成败正取决于人称选择的适合与否,这说明人称的选用毕竟经过了作家构思时的反复思量。而这种思量和选择显然与最终的叙事效果密切相关。如果对某些小说杰作进行考察,总会发现人称的选择虽看似漫不经心,但事实上总是与叙事主体对叙事文本的总体效果和全盘结构的整体考虑相关联。所以,在某种意义上,不同的人称选用往往决定了不同的小说叙事格局,使叙述人、隐含作者与读者、人物等不同要素之间产生相互作用,衍生出多样化的叙事技巧,从而造成了形态各异的叙事风貌。

一般来说,小说的叙事人称分为“第一人称叙述”与“第三人称叙述”两种。它们的实质性区别在于“二者与作品塑造的那个虚构的艺术世界

的距离不同”(罗钢 169)。第一人称叙述者生活在虚构的小说世界中,而“第三人称”叙述者则处于其外。第一人称的优势在于真实感强,“叙述行为本身便是与自我经验相联系的,可以说是自我体验的完成和总结”(罗钢 170)。而第三人称则具有“非人格性”的特点,看不见摸不着,如同一个只闻其声不见其人的幽灵。这样,叙述者可以在各个人物之间任意穿梭,也可以在物理时间与心理时间中自由出入。同时,叙事对象和叙事主体之间在心理上拉开了距离。无论选择第一人称或第三人称,首先都是基于对最大化地呈现“真实”而进行权衡的结果。从人称策略的选择本身,已经内在地包含了对“真实”内涵的不同理解与规约。倘若把人称选择置于中国小说从崇尚个人主义的“五四”新文学至民族化、大众化转型的三、四十年代这一特殊历史时段,则会发现叙事形式并非纯然的技巧问题,它与更为深隐的社会现实、意识形态的演进以及知识阶层的身份问题存在微妙的互动与牵连。

二、第一人称:

启蒙者形象的自我塑造与身份确认

呼唤个性解放并承担启蒙重任的新文学,在反对“贵族文学”、“古典文学”的宣言中打出了“国民文学”、“社会文学”(陈独秀)的旗帜。不管是陈独秀、胡适还是周作人等,都强调文学应当从传统、狭隘的文人趣味中走出来。不过,就实际的情形而论,一方面当时的新文学的倡导者、实践者和追随者,毕竟都在传统文化的根子里浸淫已久,一旦面对西方新思潮对中国传统伦理规范与价值观念的冲击,势必还需要情感和理性上的接受和思考过程。也就是说,新文化的“启蒙”使命潜在地包含了对启蒙者自身的“启蒙”。另一方面,在新旧对峙、冲撞或决裂的过程中,启蒙者自身的身份确认也成为某种隐在、但也许是更为迫切的心理诉求。因而,“五四”新文学虽然表现出强烈的启蒙冲动,但事实上,理论上的被启蒙者——“大众”——在文学叙事中,更多是作为承受社会压迫和奴役的形象,以类型化、符号化的方式来表现的。而以启蒙者自居的知识分子却得到了更为具体、完整的呈现,不少作品甚至可以看做是“先觉者”(启蒙者)的内心独白和精神造像。

早在1925年,茅盾已经注意到“牺牲了动作的描写而移注于人物心理变化的描写”(沈雁冰390),乃是西方近代小说艺术上的一大进步,也是“五四”小说艺术的一大进步。在“五四”新小说中,“人”的解放、“平民文学”的主题,更多地呈现为知识者的自我言说。陈平原先生在探讨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现代转型时也指出“‘五四’作家突出小说中的非情节因素,借用容易产生强烈感情色彩的第一人称叙事(包括日记体、书信体),以及根据人物内心感受重新剪辑情节时间,这一切当然都是为了突出作家的主观感受和艺术个性。而所有这些跟‘五四’时代个性主义思潮之强调尊重个性、尊重自我无疑是一脉相承的”(15)。从叙述方式看,第一人称叙述恰好吻合了启蒙者自我认知、自我发现和自我反思的需要。第一人称的叙述者与作者的现实身份之间的同一性,在故事层面之外,更使启蒙者的价值立场得到了直接而充分的呈现。通过一个被放大的精神主体以及对其心理情态的细腻呈现,新小说同时塑造了启蒙者的自我形象。

鲁迅的小说《狂人日记》非常突出地表现了这个特点。小说以日记体的方式,通过第一人称描述了“狂人”眼中的世界,种种令人感到惊诧、错乱、诡异的感觉和意识碎片,通过“我”的叙述而变得真实可感,小说由此让我们进入了一个“精神病患者”的心理时空。很明显,所有这些跟意识和心理领域密切相关的内容,采用第三人称转述的方式是不可想象的。最起码从“真实性”需要出发,第一人称则能够毫无隔阂地呈现一种完全不同于古典意义的“真实”。通过第一人称,这篇小说在确认“先觉者”身份的同时,也完成了启蒙者形象的自我建构。从接受层面看,第一人称叙述则历史性地消解了传统古典小说阅读中读者与叙事对象之间的隔阂:读者不仅仅是作为听故事的人或者与故事无关的旁观者,在意或不在意地“看”/“听”着小说中发生的一切。事实上,初次阅读小说,就像是面对一个谜团,谜底却在重重迷雾的笼罩中不知指向何处。“猜谜”的过程则一次次让读者重返文本,其结果是读者与日记主人公“狂人”心灵的再度遭遇。这种遭遇带来的不是阅读古典小说的消遣式的快感,反而是一种沉重的压迫感和精神的紧张。阅读本身不是愉快的享受,而是压抑、滞重、艰涩。不过,这种内在

的紧张同时也逼迫读者一步步贴近了日记主人公“疯狂”的内心,“狂人”一开始让人感到难以理解的“疯狂”逐渐地内化为读者的感受,并促使他们由文本中的象征情境延伸到对现实的理性追问和思考之中。如果不是选用第一人称,狂人的“疯狂”体验就不可能以强烈的现场感诉诸于读者的感受。同样,在以自我抒发和心理呈现为主要特征的郁达夫自叙体小说和丁玲的日记体小说中情形亦大致如此。

大致说来,五四时期的小说叙述中,第一人称所蕴含的“人的解放”的文化内涵,使它具有了区别于中国古典小说叙事模式的现代性特质,成为“五四”文学精神的一个表征。第一人称叙述所建构的“真实”,其主要内容指向知识阶层的精神层面。通过第一人称叙述,知识阶层作为启蒙者的形象获得了非常具体的凸显,同时他们作为时代潮流的引领者,其“启蒙者”的身份亦得到了比较完整的自我确认。因此,陈平原先生在考察了中国小说在叙事模式的现代转型之后指出“五四”新小说“不是比古典小说更大众化,而是更加文人化”(247)。更进一步,第一人称的叙述策略,其内在动力与其说是来自文学审美功能的需要,不如说它首先是出于知识阶层在变动的现实中,强烈的自我身份确认的内在诉求以及历史使命感的驱动。到了三、四十年代以后,新形势迫使文学进入了“由‘自我之表现’转变到‘社会之表现’的时代”,文学形式也相应随之开始产生新的变化。如果说,“五四”小说中第一人称叙述所建构的“真实”代表了知识分子夸大的自我形象的塑造,随着时代的步伐日益紧促,那个在启蒙语境中一直被强调但在实际文学叙述中却被搁置的“大众”,必然会在新的历史情境中浮动出来。

三、第三人称的复归:

被质疑的“真实”与知识者的身份危机

1930年代,就小说的人称问题曾有过一段小小的争论。这个争论虽未在文学史上产生很大的影响,但却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三、四十年代小说叙事模式继“五四”以来发生的又一次转变:即知识阶层在“五四”新文化思潮中刚刚确认的身份意识、主体意识,在紧迫的民族危机和战争境况中,不可避免地陷入了自我怀疑和焦虑之中。

1933-34年,穆木天撰文指出有些青年作家“因为他们用第一人称的写法,便减少了那些小说的真实味”,认为这种“浪漫主义者所惯用的第一人称的写法”被当作旧形式盲目地被他们利用了,这种倾向“是会把小说中的有生命的现实化成为机械的公式”。他以草明的小说《倾跌》为例,强调以底层人物为主人公的小说使用第一人称不适合,“很容易使作者把他的人物理想化”,“有害于艺术的真实性”,并且明确提出“那种第一人称的自白式的手法,是不能表现客观的复杂的现实的”(“谈写实”220-23)。文章发表后陈君治提出了反对意见,认为不能把第一人称当作旧形式;第一人称也能作为写实的手法之一;强调“作品的真实性,是要归于作者对于现实的认识和表现的手段所达到的程度的高下的问题”(“谈第一人称”230-31),为“第一人称”的“合法性”加以辩护。继之,穆、陈二人又相继对对方观点进行批驳,穆指出在“由‘自我之表现’转变到‘社会之表现’的时代”,这种“自我肯定的个人主义的抒情主义”(即第一人称写法——笔者注)又被抛弃了,坚持文学形式的时代性,“写实的小说主要地须用第三人称”(“再谈写实”231-33,“关于写实”236-38)。陈则坚持“旧的形式适合于新的内容的时候而当作表现手法被采用的时候,这形式已再不是旧的”,指责穆“犯着了自然主义的理论的根本的缺陷”(“论写实”234-36)。

从此次争论的焦点可见,“第一人称”的合法性在30年代开始受到质疑,时代风向的变换迫使作家和理论家急切地寻求着与之适应的新的叙事方式。“五四”时代备受青睐的“第一人称”叙事方式已然成为被人非议的“旧形式”,而“第三人称”似乎成了承载时代风向的新的选择。事实上,这次争论的缘起是因为穆木天发现,青年作家们以底层农工大众为主人公,“本心上是要现实主义描写社会的”;但是第一人称叙述者所采用的“自白式”手法,使得语体和人物的身份不相吻合而破坏了真实性。从根本上说,作为现代叙事模式标志之一的“第一人称”如此之快就被视为“旧形式”,实在是因为文学的表现对象和重心发生了转变——知识分子的“自我言说”所呈现的“真实”,无论是从启蒙的法理上还是从时代诉之于文学的使命上都变得不合时宜;而如何更切近地呈现“农工大众”的“真实”,成了更紧迫的现

实。在这一背景下,既有的第一人称叙述策略明显成了抵达“真实”的障碍。成仿吾在评论一篇小说时所阐述的对人称问题的见解就颇有意味:

《一叶》全体用的都是第三人称,这是很好的。我时常觉得写感情深厚的小说,如用第一人称,弄得不好,便难免不变为单调的伤感或狂热的 Sentimentalism or hysteria,如用第三人称,纵不能得到那种动的 dynamic 效果,然而它所能传到的静的 static 效果,往往有更缠绵的动人的能力,并且我觉得用第一人称,似乎比用第三人称,易于使我们感到“有人在说小说”,就是易于在我们的世界与作品的世界之间,筑起一层超越不过的墙壁。(成仿吾 183)

很显然,当叙事重心转向对现实社会和“劳农生活”的再现时,原本长于表现知识者自我内心的第一人称叙述在叙述行为与叙述对象之间制造了明显多余的隔离带。

而在穆木天和陈君治之间的争论中,双方无论是为“第一人称”辩护还是表达对“第三人称”的推崇,都同样是从它所具有的社会功能出发的——即强调在现实层面的“摹仿”(再现)意义上所谓的“作品的真实性”。此“真实”乃是指向对底层民众的现实生活是否得到了客观再现为标准——这是他们都承认的一个前提,是否及如何达到作品的“真实”亦是他们关心的共同问题。换言之,相较“五四”时期知识者的自我言说,小说“真实性”的具体内容,已经明显转向对底层民众及其生活状况的把握和再现。我们由此可以看到社会风向对文学主题和文学观念的深刻影响。同时,新文学继“五四”之后的“大众化”转向,既是紧迫现实的推动又是民族意识的催发,其中知识阶层的身份问题、它所承担的社会使命也势必接受新的质疑与检阅。

在这样的背景下,知识阶层既有的主体意识开始分裂,启蒙意识中“启蒙者(先觉者)/被启蒙者(庸众)”之间的等级结构面临崩溃,知识阶层在精神领域的自我优越感不仅显得脱离实际,而且已被视为不合时宜的东西了。战争的现实和新的意识形态唤起了知识分子较为普遍的原罪意识

和道德焦虑,文学观念相应进入了新的调整和过渡。随着此后抗战爆发和“民族形式”论争,无论是现实语境的外在制约还是观念转换的内在逻辑,都更加紧迫地驱动作家去探索能为大众所接受的文艺形式。文学的表现形式和接受对象越来越具体地沿着“大众”—“普罗阶级”—“工农兵”的线路推进,“五四”时代知识分子念兹在兹的“自我”受到严重的贬抑。启蒙文学中隐然缺席的“大众”已经成为负有巨大历史使命的社会力量,成为文学表现的重心和主体。30年代这场关于叙事人称的争论透露出“五四”之后文学风向的微妙转变,同时也能大略窥见历史语境对文学场域的建构、改写及其知识阶层的身份认同的重新书写。

四、“真实”范畴的意识形态化 与知识分子的身份抉择

历史语境变迁、意识形态的强化,乃至知识分子身份危机导致的道德焦虑,文学观念越来越侧重于对“社会性”的强调,第三人称叙事方式从而在三、四十年代逐渐占据主导地位。王任叔曾统计了当时他能看到的七八月份的杂志上的小说,特别关注了人称选择的问题:“第一,第一人称的写法绝对减少。在这五十三篇中,仅有七篇用第一人称写法”(387)。

客观地说,第三人称的确可以比较有效地抑制第一人称抒情“自我”的过度泛滥(如陈平原所说),也确实与小说创作主要以表现底层大众人物身份的内容更相切合(如穆木天所说)。不过,这也与三、四十年代以降小说观念的转变密切相关。正如吴福辉先生所指出的“人物典型化的理论和人物心理表现的理论,在这时期发展迅猛”,“三十年代‘正格’的写实小说是人物小说”(8)。

这一时期,塑造“典型性格”成了小说家和理论家们关注的核心问题。茅盾在总结抗战一年来文艺的情况时一再主张作家们去“写典型人物”,并不无鼓舞之意地指出“新时代的各种典型已经在我们作家笔下出现了”(“八月的感想”5-14)。老舍也提出“创造人物是小说家的第一项任务”(75),另有欧阳凡海则明确指出一九四〇年上半年的文学创作的倾向之一是“着力于性格

的描写”(76)。至于人物如何写法、性格怎样塑造,一般都强调通过动作对话来展现。如茅盾在谈及文艺“大众化”问题时认为必须使用“大众所能懂的形式”,而它的三个原则之一即是“多对话,多动作;故事的发展在对话中叙出,人物的性格,则用叙述说明”(“文艺大众化”765)。其后又更加具体地指出写小说在“观察人”时“不可把人孤立起来看。凡人皆是社会人,他的思想与意识在与别人接触时显现出来的,他的社会价值也是放在复杂的社会关系中而始确定的。所以看人的时候,应当与他的周围联系起来看,换言之,即是要在他的社会关系上去看,要在他怎样应付人事等等行动的总体上去看”(“八月的感想”26-27)。

不难看出,这些观点都是对恩格斯的经典理论“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的引申和发挥;另一方面,又显然与中国古典小说的叙述模式有暗合之处,与“五四”新小说第一人称叙述中的浪漫主义特征相比,这种通过动作、对话刻画人物、塑造性格的叙事观念已经隐露出后来文学主潮所强调的“民族形式”的明显特征了。注重人物的社会性,包括身份、职业特征、阶级归属、社会关系,把人物放在社会的规定性情境中加以展现,这样,人物的“性格”中就突出了社会属性的一面,这种“典型性格”的塑造是要求从人物身上折射出“类”的普遍性和社会生活的广阔性——从而显示出“社会人”特质。基于此,第三人称叙述显然既具备了历史的合理性,切合了文学主题对时代的呼应,又使得作家在创作中可以尽量抑制个人主观的感性因素,而从社会、时代的公共立场来审度人物和环境的关系,按照所谓的“性格逻辑”来调控对人物的描写。

三十年代以来,由于“典型”理论逐渐被确认为小说创作的基本法则,小说创作无论是在内容还是在形式上的限定都开始变得明确、具体,第一人称叙述中不受节制的自我言说的方式得到了有效抑制。作为小说创作的理论指导,它确实能使作家对小说的形式和技巧给予更为冷静的体悟和思考,同时以更为理性的方式考量文学自身的规律。这一阶段,以第三人称为主的叙述策略在某种程度上修正了“五四”时期“第一人称”叙事所带来的自我泛滥。尽管如此,当“典型”理论中对小说的主题和形式的明确规定作为文学创作的普

遍原则之时,也会悖离文学自身发展的内在规律,存在将文学创作引入模式化的危险。

及至40年代,《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所确立的新的文艺政策以不容置疑的强制性首先对知识阶层的身份做出了明确规约,迨至文学创作的立场、对象、主题乃至表现形式等皆得到了全面的指令性规定。如此一来,作家在小说创作中所能保有的自主空间已经相当有限,小说创作与作家的主体体验、观察、思考乃至艺术形式、技巧的自主性选择逐渐分离。小说“真实性”的内涵,由于较为明确的意识形态规约,“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的外延更收缩为阶级斗争的二元对立结构。如周扬在分析作为“方向”的赵树理小说人物塑造的成功经验时所说的那样“他总是将他的人物安置在一定斗争的环境中,放在这斗争中一定地位上,这样来展开人物性格的活动”,以及“他总是通过人物自己的行动和语言来显示他们的性格,表现他们的思想情绪”(394-96)。在这样的语境中,人称选用的策略潜在地被框定为努力呈现乡村环境的原生状貌,力避小资产阶级的不良情调;当然,这种呈现绝不能是民俗学意义上的质朴、粗野、颠颠,而是严格遵循阶级斗争过程的生动展开。

与此同时,自“五四”以来至三十年代的知识阶层日益严重的身份焦虑,已经从个体的心理困境进入到在社会历史巨轮推促下的必须面对的自我抉择。在这样急剧变动的时代风云面前,每个个体的身份认同和选择呈现了复杂、曲折的多元化形态。在“左转”的知识分子中,不乏有如何其芳、冯至那样出于对“新社会”的乌托邦式的想象,顺利适应“转折期”的一批,当然更多的人经历了程度不同的“磨合”或牴牾,如历经改造而成为革命文学代表作家的丁玲、怀着“疑惧”谨慎靠拢的萧乾、与新意识形态共生共长的赵树理,以及最终选择拒绝的沈从文等等。^①然而,不管他们在身份抉择上存在多少差异,但抉择本身并不意味着知识阶层的身份问题就此得到了一锤定音的了结。在随后开始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中,有关知识者的身份事实上进入了一个波谲云诡的历史过程。

上文我们对中国现代小说自“五四”以来在人称问题上的变迁进行了简要的梳理。在现代文学发生、发展最初这二、三十年中,作为小说叙述

形式的人称问题与不断变换的历史语境之间始终存在着密切的互动。倘若以历史的眼光来看,二十世纪初开始,从西方移植过来的诸多文艺思潮中,基于现代文学对于宏大社会历史使命之承担的内在诉求,“现实主义”最终成为几乎贯穿了整个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主导范式。而“现实主义”的核心范畴“真实”,几乎在每个时段,都成为评判文学价值最核心、最不容置疑,但同时其内涵也最富于争议的一个关键词。这之中,即使是看似无足轻重的叙述人称策略的选择、调整,亦可窥出文学的“真实”内涵,与其移植之初的意义并非完全吻合,而是与特定的历史语境处于动态的建构过程。这意味着,所谓“真实”,当其从理论的法则进入到实践之时,必定与其时代存在着或隐或现的“对话”关系。而对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后的中国文学来说,由于知识阶层的身份与意识形态场域的调整之间越来越微妙的关系,人称问题背后,又折射出知识阶层身份的自我认同不可避免地与社会现实、意识形态的转型等时代的风云际会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虽然这只是浩浩历史中极其微观的一个细节,但也足以值得我们从中细细勘悟中国现代文学的玄奥与离奇。

注释 [Notes]

①贺桂梅在著作《转折的时代——40-50年代作家研究》(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3年)一书中曾以上述作家为个案,较为细致和全面地研究了“转折期”作家基于不同原因和不同立场对于新意识形态所采取的各种态度。

引用作品 [Works Cited]

陈平原《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

[Chen, Pingyuan. *Transformation of Narrative Mode in Chinese Novels*.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03.]

陈君治“谈第一人称写法与写实小说”,《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三卷,吴福辉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

[Chen, Junzhi. “On the First Person Narrative and Realistic Novels.” *Theoretical Resources of the 20th Century Chinese Novels*. Vol. 3. Ed. Wu Fuhui.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1997.]

——:“论写实小说答穆木天”,《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三卷,吴福辉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

[———. “On Realistic Novels: A Reply to Mu Mutian.”

- Theoretical Resources of the 20th Century Chinese Novels*. Vol. 3. Ed. Wu Fuhui.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1997.]
- 成仿吾 “《一叶》的评论”, 《王统照研究资料》, 冯光廉、刘增人编。银川: 宁夏人民出版社, 1983年。
- [Cheng, Fangwu. “A Comment on Yi Ye.” *Research Materials on Wang Tongzhao*. Eds. Feng Guanglian and Liu Zengren. Yinchuan: The People’s Press of Ningxia. 1983.]
- E. M. 福斯特 《小说面面观》, 苏炳文译。广州: 花城出版社, 1984年。
- [Forster, E. M. . *Aspects of the Novel*. Trans. Su Bingwen. Guangzhou: Huacheng Publishing House, 1984.]
- 老舍 “怎样写小说”, 《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四卷 钱理群编。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7年。
- [Laoshe. “How to Write a Novel.” *Theoretical Resources of the 20th Century Chinese Novels*. Vol. 4. Ed. Qian Liqun.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1997.]
- 罗钢 《叙事学导论》。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1992年。
- [Luo, Gang. *An Introduction of Narratology*. Kunming: The People’s Press of Yunnan, 1992.]
- 茅盾 “八月的感想——抗战文艺一年来的回顾”, 《小说研究史料选》, 黄俊英编。成都: 四川教育出版社, 1988年。
- [Mao, Dun. “Thoughts in August: A Review on the Last Year’s Literature for Anti-Japanese War.” *Resource Materials of Researches on Novels*. Ed. Huang Junying. Chengdu: Sichuan Education Press, 1988.]
- : “文艺大众化问题——上月在汉口量才图书馆的讲演”, 《中国现代文学史参考资料》(五四-1942) 第一卷 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现当代文学教研室编。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1955年。
- [- - - . “On the Popularization of Art and Literature: The Speech at Liangcai Library in Hankou.” *Reference Materials on the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from the May 4th to 1942)*. Vol. 1. Beijing: Higher Education Press, 1955.]
- 穆木天 “谈写实的小说与第一人称写法”, 《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三卷, 吴福辉编。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7年。
- [Mu, Mutian. “A Note on the Realistic Novels and the First Person Narrative.” *Theoretical Resources of the 20th Century Chinese Novels*. Vol. 3. Ed. Wu Fuhui.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1997.]
- : “再谈写实的小说与第一人称写法”, 《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三卷, 吴福辉编。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7年。
- [- - - . “Another Note on the Realistic Novels and the First Person Narrative.” *Theoretical Resources of the 20th Century Chinese Novels*. Vol. 3. Ed. Wu Fuhui.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1997.]
- : “关于写实的小说与第一人称写法之最后答辩”, 《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三卷, 吴福辉编。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7年。
- [- - - . “A Final Note as a Defense on the Realistic Novels and the First Person Narrative.” *Theoretical Resources of the 20th Century Chinese Novels*. Vol. 3. Ed. Wu Fuhui.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1997.]
- 欧阳凡海 “一九四〇年上半年文学创作的一般倾向”, 《小说研究史料选》, 黄俊英编。成都: 四川教育出版社, 1988年。
- [Ouyang, Fanhai. “The General Trend of the Literary Works in the First Half of 1940.” *Resource Materials of Researches on Novels*. Ed. Huang Junying. Chengdu: Sichuan Education Press, 1988.]
- 沈雁冰 “人物的研究”, 《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二卷, 严家炎编。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7年。
- [Shen, Yanbing. “A Study of Characters.” *Theoretical Resources of the 20th Century Chinese Novels*. Vol. 2. Ed. Yan Jiayan.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1997.]
- 王任叔 “中国现代小说发展的动向的蠡测”, 《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三卷, 吴福辉编。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7年。
- [Wang, Renshu. “A Personal View of the Trends of Modern Chinese Novels.” *Theoretical Resources of the 20th Century Chinese Novels*. Vol. 3. Ed. Wu Fuhui.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1997.]
- 韦恩·布斯 《小说修辞学》。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7年。
- [Booth, Wayne C. . *The Rhetoric of Fiction*.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1987.]
- 吴福辉 “前言”, 《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三卷, 吴福辉编。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7年。
- [Wu, Fuhui. “Preface.” *Theoretical Resources of the 20th Century Chinese Novels*. Vol. 3. Ed. Wu Fuhui.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1997.]
- 徐岱 《小说叙事学》。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2年。
- [Xu, Dai. *Narratology of Novels*. Beijing: China Social Sciences Publishing House, 1992.]
- 周扬 “论赵树理的创作”, 《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四卷 钱理群编。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7年。
- [Zhou, Yang. “On Zhao Shuli’s Literary Writing.” *Theoretical Resources of the 20th Century Chinese Novels*. Vol. 4. Ed. Qian Liqun.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1997.]

(责任编辑: 王 峰)